東吳中文學報　第三十四期
2017 年 11 月　　頁 205-226

airiti

桅影重疊與醫國隱喻：《花月痕》中的「逆倭」及時局寄託*

曾 世 豪**

提　要

付梓於清中葉的《花月痕》，一般被歸類於狎邪小說，內容也確實以韋癡珠、劉秋痕／韓荷生、杜采秋兩對愛侶的繾綣纏綿為主旋律。然而，這部作品同時也是作者魏秀仁的自況之作，除抒發仕途不遇的鬱悶之外，更反映了當時中國所面臨的變局，包括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太平天國、回變、捻軍等傷痕。饒富意味的是，魏秀仁在提到相關事件時，皆以「逆倭」作為影射，有意識地將歐洲殖民者架空為倭寇入侵，並由韓荷生蕩平敵軍，恢復天朝秩序為發展。這樣的敘事策略，召喚了時人對明朝倭寇騷擾之記憶，將日本／歐洲等量齊觀，關鍵在於同樣揚帆而來的海洋威脅，衝擊了中國封閉的陸權地位；此外，倭寇與沿海居民的串連、南倭北虜的蹂躪，更合理地轉化為小說中內叛與外侮的沆瀣一氣。從現實的艱辛考量，韋癡珠貧病交加、銅駝荊棘的淒楚，劉秋痕亦隨之殉情的結局，象徵了中國無力於抵禦內憂外患的困境；然而，魏秀仁同時刻劃了韓荷生談笑封侯、攬轡澄清的得意，杜采秋亦典封一品夫人，可以說是作者對於中國浴火重生、夷狄歸化的秩序觀想像──透過兩種政治生涯的隱喻，當能看出小說家對時局的焦慮與寄託。

關鍵詞：《花月痕》、倭寇、歐洲、鴉片戰爭、太平天國

---

* 拙文初稿曾宣讀於「東アジア文化交涉学会・第8回年次大会『東アジア交涉学の新しい歩み』」（関西大学東アジア文化交涉学会主辦，105 年 5 月），會中承蒙張崑將老師賜教，投稿期間兩位匿名審稿委員亦提供珍貴之意見，獲益良多，謹此一併申謝。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講師

收稿日期：106 年 5 月 24 日；接受刊登日期：106 年 11 月 26 日。

airiti

一、前言

《花月痕》[1]是清代文人魏秀仁（字子安，1819-1874[2]）重要的小說著作，敷演兩對才子佳人──「韋癡珠／劉秋痕」與「韓荷生／杜采秋」的愛情故事。儘管作者以豐富的才學傾注於文本，讓作品充斥著詩文與淒婉，但因為男、女主角為恩客／名妓的組合，自然地被魯迅歸類為「狹邪小說」。[3]

雖然如此，《花月痕》卻不單純是一部耽溺於青樓的文學創作。作者魏秀仁作為一位出身福建，卻因列強入侵、太平天國（Taiping Heavenly Kingdom，1851-1872）亂起而顛沛流離於川、晉的南方士人，有感於家國動盪、懷才不遇，遂將時代世變化為小說的布幕，上演的是窮如韋、劉（貧病交加而終於鬱抑）；達如韓、杜（驅逐外侮而平步青雲）的極端戲碼──但二者皆是作者自況。[4]然而，學界卻很少深入探索小說影射的宏大敘事，如王德威認為，小說高潮應該在於韋、劉之死，後來韓、杜的飛黃騰達，是生硬矯情的蛇足，《花月痕》並未達到《桃花扇》中侯方域與李香君那般，眷侶情感與南明命運交織之境地：

> 小說裡被敘述的歷史事件，從太平軍起義到內憂外患，其實標誌著傳統樣式的國族巨變，既可促成朝代的更替，亦可造就艷情的悲劇。然而《花月痕》的歷史敘述卻不再能以傳統的方式，言傳歷史事件，它充其量能回想巨變之餘的瑣碎痕跡。韋、劉兩人的世界裡，宏偉敘事已成廢墟，他們所能經歷的，僅僅是所謂情天恨海的末流。[5]

倘若讀者期待著「歷史的關聯性」能在韋、劉的愛情故事中嶄露驅策與收束的因果關係，自然不免感到失望。然而，就小說發展的脈絡來看，讀者不當僅留意於韋、劉之淚痕，忽略了作者的另一層寄託──韓、杜攬轡澄清的鉅大功業，而其中屢屢提到的平定「逆倭」之武功，即是本文所欲討論的主題。

從藝術價值的角度來說，有論者認為小說寫至 44 回劉秋痕的殉情即當收筆，此時仍不失為一部完整的長篇佳構，對後 8 回的妖婦妖法與詆毀太平天國，

---

1 本文根據版本為〔清〕魏秀仁：《花月痕》（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6 年），以下為行文方便，所引原文但標回數、頁碼，不另加註。

2 據容肇祖：〈花月痕的作者魏秀仁傳〉，收於王俊年編：《中國近代文學論文集(1919-1949)：小說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年），頁 194-206。

3 魯迅：「其書雖不全寫狹邪，顧與伎人特有關涉，隱現全書中，配以名士，亦如佳人才子小說定式。」見氏著：《中國小說史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182。

4 魯迅：「韋、韓，又逋客之影子也，設窮達兩途，各擬想其所能至，窮或類韋，達當如韓，故雖自寓一已，亦遂離而二之矣。」見氏著：《中國小說史略》，頁 184。

5 王德威著，宋偉杰譯：《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台北：麥田出版事業部，2003 年），頁 112-113。

發出白璧微瑕之批判。[6]不過，一如金洛喆（Kim Nak-chul）所提到的，魏秀仁在世期間，中國正處於內憂外患接踵而來的困境，要了解小說家的時代，必須從1840 年英國對中國發動鴉片戰爭說起，《花月痕》第 31 回即作了一首〈鴉片歎樂府〉。不僅如此，洪秀全等附會西洋之耶教，建立太平天國，造成中國傳統信仰及風俗的撼搖，也加深了中國人對列強的仇恨。在太平天國期間，又有英法聯軍之役，是以魏秀仁之創作深受其時代之影響。[7]且據舒揚帆，創作者親歷道光、咸豐年間的烽火，不只清政府在兩次鴉片戰爭（Opium War，1839-1842、1856-1860[8]）與太平天國運動中疲於應付，自己的家人亦困於戰區，避居異地的魏秀仁，就連父歿亦無法奔喪，這種混亂與淒苦所帶來的衝擊，可想而知，是以小說流露出強烈的批判意識，確實相當值得注意。[9]

上述「國／家」之局勢，與小說的創作年代也有相互參照之處。《花月痕》全書共 52 回，一般認為前 44 回脫稿於咸豐 8 年（1858）客晉、川幕僚之際，其中如 42 回寫「羣醜自屠」影射太平天國諸王內鬨（1856）；43 回寫「逆倭」自廣州海道竄入津門，則是英法聯軍由廣州出發，攻打大沽口（1857-1858）的路線之反映，可知小說與時局的緊密關係。後 8 回雖稍有爭議，如有陳新認為的同治 3 年（1864）、尚達翔認為的同治 5 年（1866）、官桂銓認為的同治 7 年（1868）等，但總之應該在太平天國「幼天王」洪天貴福被俘之後（1864，第 50 回亦有相關史事的影射）。[10]

職是，倘若只留意到《花月痕》哀豔悱惻的狹邪屬性，恐怕是不太夠的，還必須另闢蹊徑地探索其中的殺戮與兵燹，才能看到作者深層的生命際遇。饒富意味的是，當魏秀仁在敘及英、法列強的騷擾時，皆以「倭」影射之，但是「倭」在中國人的理解中，指的應該是日本而非歐洲。

身為一位來自沿海省份的飽學之士，不應當分不出兩者之間的差異，顯然這是作者特殊的敘事策略，究竟為何小說家將二者鎔鑄為一？其次，在現實中縛手無策的困頓文人，如何在小說中馳騁放蕩不羈的虛構特權，拯救中國於水深火熱之中，抒發作者的秩序觀想像？這關係到在 44 回之後，魏秀仁的續寫是「畫蛇添足」抑或「畫龍點睛」。最後「韋癡珠／劉秋痕」與「韓荷生／杜采秋」兩種作者自況，有沒有其他的詮解方式？窮或達難道僅只於個人的命運嗎？筆者認

6 尚達翔：〈魏秀仁和他的哀豔小說《花月痕》〉，《明清小說研究》第 4 期（1988 年），頁 192。

7 （韓）金洛喆（Kim Nak-chul）：《花月痕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年），頁 3-8。

8 第二次鴉片戰爭亦即英法聯軍之役（Franco-British expedition to China）。

9 舒揚帆：〈試論魏秀仁《花月痕》的自敘性──兼及藝術淵源與影響〉，《呼倫貝爾學院學報》第 21 卷第 6 期（2013 年 12 月），頁 52-53。

10 以上關於作品繫年之研究，參詳陳芳華：〈百年來《花月痕》研究評述〉，《遼寧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 11 卷第 1 期（2009 年 1 月），頁 53。

為，一個貧病交加的孱弱身體，和功成名就、齊人之福的終局，恰好是兩種政治隱喻的對比──「先睡後醒」（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11]的中國即將浴火重生的幻想。以下先就「綰合的緣由」說明之。

二、綰合的緣由：南倭北虜的記憶

自鴉片戰爭以來，清朝經歷諸多嚴峻的挑戰，包括太平天國、英法聯軍、陝甘回變（Dungan Revolt，1862-1873）、捻軍（Nian Rebellion，1853-1868）等等。這些事件並無一個嚴密連貫的組織系統，時間順序亦長短不一，但是在《花月痕》中卻俱被兜籠在一塊，被解釋為倭寇與奸民的勾結：

> 逆倭連年由海道蹂躪各省，北則天津、登萊，南則由寧波滋擾浙江，由瓜州滋擾三江。復援金人冊立偽齊故事，封了粵西巨寇員壽泉，竊踞金陵。於是淮海之間，大河南北，以及兩湖，土匪蜂起，逆倭遂得以橫行無忌。朝廷賦額日虧，軍儲日絀，全靠西陲完善之區，轉輸支應。山右尤畿疆屏蔽，西北膏腴。是年春間，豫州節度武公部下官軍，迭獲勝仗；逆倭勢蹙，勾引河東土匪，竄入平陽，計欲結連關外回、番各部，由草地潛入燕雲。（第 4 回，頁 19）

在魏秀仁的塑造之下，太平軍、回變、捻亂等，皆出於海外逆倭的教唆，這當然是作者的想像。[12]但要稍微釐清的是，小說是絕對允許虛構的文學載體，全書亦

---

[11] 參考自曾紀澤：〈中國先睡後醒論〉（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1887 年。原文為英文，中文版本收於〔清〕龔自珍、〔清〕康有為、〔清〕梁啟超等著，龍應台、朱維錚編注：《未完成的革命──戊戌百年紀》（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頁 90-96。

[12] 以太平天國的情報為例，在當時就相當複雜。在日本，與《花月痕》中視之為「逆倭」（實際上是歐洲人）扶植的說法相反，包括《雲南新話》、《清明軍談》、《韃靼勝敗記》、《新說明清交戰記》、《外邦太平記》、《滿清紀事》、《清賊異聞》等小說讀物，都將太平軍視為朱明後裔「反清復明」的組織，或是「天地會」支派「小刀會」的成員，而多數認為英國站在支援清軍的立場，與「明軍」（太平天國）酣戰，但清、英聯軍被打得落花流水，只有《清賊異聞》以清軍之勝利為結尾。這些作品基本上根據中國、朝鮮等船隻傳至長崎（Nagasaki）的傳聞寫成的，但據培里來航（Perry Expedition，1853）時來自接待人員的問答手寫本，則是「英吉利援明，戰鬥激烈云。美利堅乘隙，欲攫取日本云」，英國被視為太平軍的擁護者，此則與《花月痕》不謀而合。日本之所以關注太平天國，肇因於美國叩關的威脅，亟欲摸清列強對此事的態度，從而調整外交方略。見（日）增田涉（Masuda Wataru）著，由其民、周啟乾譯：《西學東漸與中國事情》（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 年），頁 78-99。英國輿論對太平天國的立場，雖然在一開始因其「基督教」、「受壓迫的漢人」之屬性而抱持同情，但國會仍堅守中立，直到戰亂波及到上海、寧波等通商口岸，洋商生命、財產受到威脅，清政府亦將因失去收取關稅的城市而支付不出戰爭賠款；且美國南北戰爭（American Civil War，1861-1865）造成棉花供應縮減，已衝擊國內紡織業，若再加上中國茶葉進口短缺

不直接道破筆下所寫的「員逆倡亂」，就是洪秀全（小說中以「粵西巨寇員壽泉」來暗示之）打造的太平天國。其實，《花月痕》在開卷頗有模仿《紅樓夢》之處，亦由敘事者發現了某部「朝代年紀，失落無考」[13]的作品為始：

> 五年前，春凍初融，小子鋤地，**忽地陷一穴，穴中有一鐵匣，內藏書數本，其書名「花月痕」，不著作者姓氏，亦不詳年代。（第 1 回，頁 3）**

《花月痕》確實曾受《紅樓夢》影響，文中甚至有針對該書的討論。[14]然而筆者的意見是，魏秀仁本來應該無意將小說限縮在某個經緯分明的時代座標，所以故事背景不必是明是清，帶有模糊化的空間，捏合倭寇或員逆，亦無須過於嚴格地按圖索驥。不過，隨著故事的進行，作者慢慢開始洩漏出落干線索，如第 20 回出現「明末葛嫩、楚雲、瓊枝」、第 25 回快談《紅樓夢》，在在暗示了敘事舞台正是「明末」以降、「《紅樓夢》」問世的那個朝代，也就是大清（縱使小說中從未出現確切的朝代名稱）。

過去對於作者及《花月痕》小說中對內憂外患的反映，已累積了一定程度的討論。那麼，筆者欲追問的是，為何小說家會在一個暗示今夕為清季的文本中，召喚顯然屬於明代的海盜記憶？道、咸年間叩關而來的歐洲殖民者，為何會與中國人熟悉的倭寇產生聯繫？這個問題，當可由以下幾個層面切入。

首先，中國人對殊方異域的認識，儘管隨著交通的便暢而拓寬行旅的範圍，帶有實錄性質的記載不斷產出，但這些親歷資訊仍有大部分沿襲著古史、傳說與類書，在字裡行間充滿了匪夷所思的想像，滲透進觀察者的固執與偏見，這與中國自視「文明」而以四夷為「野蠻」的天下觀互為表裡──換句話說，這些描述並不等於當時人對於實際世界的知識。[15]從以上來看，中國人對外邦之理解，本就有以「想像」附加在「真實」之上的習慣，且據王昊的觀察，此現象放在小說

（太平軍控制了主要產地），茶價飆漲，恐造成經濟崩潰，英國終於決定介入，除民間早已有傭兵「洋槍隊」（後易名「常勝軍」）受雇於滿清，官方更出售軍艦協助清廷剿滅太平天國（儘管後來計畫告吹），魏秀仁之說當然與事實相違。當時歐、美對太平軍之看法，可詳參（美）裴士鋒（Stephen R. Platt）著，黃中憲譯，譚伯牛校：《天國之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全球與地區問題出版中心，2014 年）。

[13] 《紅樓夢》第 1 回云無才補天之頑石上有小說文字，字跡分明，編述歷歷：「上面敍着墮落之鄉，投胎之處，以及家庭瑣事，閨閣閑情，詩詞謎語，倒還全備。只是朝代年紀，失落無考。」見〔清〕曹雪芹：《紅樓夢》（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4 年），頁 2。

[14] 除了第 25 回回目是「影中影快談紅樓夢，恨裏恨苦詠綺懷詩」外，金洛喆認為，從 36 回杜采秋夢見韓荷生幻化韋癡珠、鏡中不見自己影子，只見劉秋痕，以及韓、韋二人象徵「荷」花上滴著露「珠」、采秋、秋痕共用「秋」字等跡象，不僅可見倣效《紅樓夢》中，寶玉為釵、黛兩人嵌合的「二名一身」之手法，更可見釵、黛地位並立，且在全書主線不可分的特點。見氏撰：《花月痕研究》，頁 30-31。

[15] 詳參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 年），頁 80-86。

之文體，更容易出現這種挪移、架空、摻雜的現象，即便到了與西方列強頻繁接觸的清中葉，也沒有機警地催化出本質上的變化。[16]

魏秀仁並非不了解逆倭與歐人的差異，其能精闢點明中、英之齟齬乃「追原禍始阿芙蓉，膏盡金錢血盡鋒」（第 20 回，頁 161）、「外洋癖中土，製作鴉片煙」（第 31 回，頁 268），還在書中作了一首〈鴉片歎樂府〉。當西方殖民者有計劃地向中國輸入毒害百姓身心的洋煙（阿芙蓉、鴉片），擴大貿易逆差，這種布局的危險性自然遠大於明代倭寇的打家劫舍；能看透此病灶，證明小說家清楚認知到「逆倭」絕非日本。

此外，第 47 回又提到顏卓然對倭目宣詔：「天主教雖勸人為善，而漢人自有聖教，不准引誘傳習。」（頁 395）但傳教並非日本染指中國的動機之一，此處關於教案的紛爭，還是在影射歐洲列強。[17]然而，小說創作者在寫實的筆墨之餘，對於「倭國」仍添加一抹瑰奇的色彩：

> 不一年，賞加頭品頂戴，冊封倭國新女主踏裏采。朝議令挈妻室同行；靚兒得女提督銜，持節賚皇太后恩旨，副以紫滄夫婦，由長江登火輪船，灣入粵東香山島放洋。遇風吹入了香海洋。玉宇瓊樓中，父子重逢，翁媳再見。瑤華緣與靚兒同舟，也得與秋痕相見世外。三人都得島中人贈的珍寶。一夜海風大起，瞬息之間，便到倭國，與紫滄輪船相會。（第 51 回，頁 429）

作者用傳奇手法，讓韋小珠夫婦在航往「倭國」的道途中，與先父韋癡珠在香海洋青心島[18]相會──以仙境作為中介，終點則更在仙境之外，「倭國」的神秘性質不言可喻。話又說回來，當時英國（兩次鴉片戰爭中，清廷的主要對手）領袖固然是位名聞遐邇的「女主」：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1819-1901），其登基的正當性卻與清帝的授權與否無涉，但是中國也並非沒有冊封過「倭國女主」的經驗，最著名的便是三國時代的「親魏倭王」卑彌呼（Himiko）[19]，魏秀仁巧

[16] 王昊注意到，即使是在鴉片戰爭之後約六十年時間裡，中國域外題材小說也並未隨著時代的巨變而發生急遽的改觀，而是在原有的寫作慣性下推動沿著傳統的軌跡繼續運行著，這就與中國人對於異邦的理解互為表裡，也是古典小說創作頗值得注意的文化現象。見氏著：《從想像到趨實：中國域外題材小說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頁 145。

[17] 英法聯軍之役中，法國即以神父馬賴（Auguste Chapdelaine，1814-1856）在廣西西林的遇害，作為出兵之緣由。

[18] 在小說的設計中，韋癡珠前世為此處仙主，其妻妾、情人則為其案下曹司，分別掌管恨水、愁山、淚泉、冤海等司，因誤辦公案，耽誤許多癡男怨女，因此被罰謫降人世，親歷情苦，後來才重返舊居，歸列仙班。

[19] 《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記載景初 2 年（238 年）魏帝詔書報卑彌呼：「今以汝為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假授汝。其綏撫種人，勉為孝順。」見〔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卷 30〈烏丸鮮卑東夷傳〉，頁 857。

妙地利用想像力，模糊化了二者之間的份際。

其次，中國的海防經驗始自明朝，而對治的假想敵則一直為倭寇。饒富意味的是，即使自德川幕府（Tokugawa shogunate，1603-1868）建立並採取鎖國政策、朱明亦改朝換代為滿清後，這個戰略思維都未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李恭忠、李霞便注意到，自嘉靖朝鄭若曾《籌海圖編》、明末清初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乃至於鴉片戰爭前夕，親歷海事的嚴如煜所撰之《防洋輯要》，皆忽略了是時叱吒風雲的歐洲艦艇：

> 從思想內容來看，嚴如煜這本書同樣沒有超出明中期以來「備倭」話語的框架，書中關於江南和廣東兩地海防的論述即為明證。卷九「江南防海略」首先描繪海防對象：「倭奴天性狡猾，以剽劫為俗，而溟海萬里，因風力，乘潮候，倏忽不可踪迹，所謂來如風雨，去如絕弦，猶不足以喻之，時復跳梁。」[20]

這種現象產生的緣由，在於日本帶給中國的威脅，確實是前所未見的挑戰，刺激了海防觀念的萌芽，且海防論是一種相對偏僻的知識領域，一旦形成某種論述框架，後人往往相互沿襲，士大夫又重視歷史記憶的保存，慣於自經驗教訓中尋求對現實的借鑒。[21]這其實與上述中國人對異邦之理解有異曲同工之妙：文人重於既有文獻的傳承，即便有新知識的汲取與背書，仍喜以古律今，失去了與時俱進的敏感度。在這種情況之下，魏秀仁在《花月痕》小說中，將同樣來自海上的歐洲列強，綰合因季風、乘潮汐而來的「倭寇」，也就不足為奇了，因為這是貫串明、清，一般人熟悉的歷史經驗──即便在甲午戰爭（First Sino-Japanese War，1894）之前，清、日之間從未有過駭火的紀錄。

此外，倭寇的組成本身就是複雜的，日本人之外，不僅曾經包含葡萄牙人，甚至還有中國人。1522 年西草灣之戰（Battle of Xicaowan），明朝水師將馬爾丁・阿方索・德・梅羅・克亭何（Martim Afonso de Melo Coutinho）率領的船隊定位為「佛狼機國人」入寇，徹底將其擊潰，自此葡人被視為倭寇同夥，被禁止沿海貿易，遂轉入浙江雙嶼建立基地，聯合中國人包括許棟、王直等魁首，以及琉球、日本各地商人，進行走私、海盜活動──這種違反國禁的黑市交易，很自然地被官憲目作寇賊、海寇、倭寇，終於在 1548 年為浙江巡撫朱紈驅逐。[22]從上述來看，

---

[20] 李恭忠、李霞：〈倭寇記憶與中國海權觀念的演進──從《籌海圖編》到《防洋輯要》的考察〉，《江海學刊》第 3 期（2007 年 3 月），頁 153。

[21] 詳參李恭忠、李霞：〈倭寇記憶與中國海權觀念的演進──從《籌海圖編》到《防洋輯要》的考察〉，頁 154。

[22] 詳參（日）田中健夫（Tanaka Takeo）著，楊翰球譯：《倭寇──海上歷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7 年），頁 64-71。另鄭樑生亦認為「葡萄牙之入寇者」當納入倭寇譜系，見氏著：《明代中日關係研究──以明史日本傳所見幾個問題為中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 年），頁 304。

在中國人的理解中，早自明季開始，歐洲人便與倭寇沆瀣一氣，這些異族除外貌有白、黃之別，本質上卻並無太大迥異，魏秀仁以「逆倭」稱呼英、法列強，亦屬其來有自。

進一步來說，倭寇夥伴中的中國人成份，更是踩住了一般民眾心目中的痛腳，《明史・日本傳》說：「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23]，倭寇在後來以中州編戶之齊民為主體，這已為時人可以理解的事實，再加上嘉靖時期，海有島氛，陸有韃靼，「南倭北虜」造成國家軍事、財賦上極大的壓迫，這些自然是中國人記憶猶新的夢魘。當道、咸之後，內憂外患再度從海上、內陸紛沓而至，亦不斷召喚「南倭北虜」的慘痛記憶，降而為《花月痕》小說，列強與叛亂也被創作者曲折地聯繫在一塊，形成外侮與內叛、倭寇與胡人攜手合作的醜惡戲碼，第 2 回寫道：

> 後來倭寇勾結西域回民作亂，四方刀兵蠢動，民不聊生。汪公奉命防海，明公奉命經略西陲。（頁 8）

第 4 回有明祿告示云：

> 爾陝甘回民，自李唐以來，轉徙內地，食毛踐土，千有餘歲。我朝天覆地載，漢民回民，從無歧視。乃者逆倭犯順，天地不容，神人共憤；鼯是已窮之技，豕無可突之圍；釜底遊魂，苟延旦夕。爾等乃受其指揮，幷勾番部，兼脅良民。（頁 23）

第 37 回敘事者如是說：

> 話說關、隴回子，自去年大受懲創以後，善良者自然回籍，重謀生業；就中單身的，也就地方官安插，洗心滌慮，去作良民。只有一班狡黠的酋豪，或逃亡在外，復出為非；或雖受招安，家業已蕩，便糾合亡命，就近作個強盜，擄掠鄉民牛畜，搶刼過往行旅。地方官只怕多事，隱忍不報。這回子嘯聚得多，去年逆倭踞了廣州，回子得信，因又跳梁起來。（頁 313）

又 46 回梅小岑又奏摺提到：

> 自倭逆內犯，勾結水陸劇盜，以及回疆西藏。（頁 380）

這些都可看作是清朝版的「南倭北虜」，如顏卓然宣詔提到：「乃躪東南，遂窺西北」（第 47 回，頁 394），只不過本質上不再是日本與蒙古，而換成了歐洲人與穆斯林。除上述逆倭與少數民族的串連外，崇尚「拜上帝教」的太平天國，亦被

[23]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卷 322〈日本傳〉，頁 8353。又云：「當是時，日本王雖入貢，其各島諸倭歲常侵掠，濱海奸民又往往勾之。」（卷 322〈日本傳〉，頁 8351）

小說家目為倭寇扶植的傀儡政權；值得玩味的是，即使太平軍本身與日本並無任何干係，歐、美基督教國度亦抱持著非我族類的態度[24]，但在日本卻有革命家大鹽平八郎（Ōshio Heihachirō，1793-1837）父子西渡中土、組織太平天國的傳說。[25]此說雖荒誕不經，頗有自我抬舉之味道，應非魏秀仁所服膺者，不過以日本人（逆倭）作為太平軍的導師，中、日兩種文本還是發生了微妙的互文關係。

綜合上述，筆者認為《花月痕》將倭寇與歐洲人船艦鎔鑄的緣由，基本上來自於中國文人習於以來既有文獻來「想像」異域，哪怕在當代已累積一定接觸與研究的外國人，仍慣於比附舊有的知識與偏見。更重要的是，以海防觀念的演進來說，明、清兩朝皆以倭寇為假想敵，對於破浪而來的英、法列強，魏秀仁亦直接以倭寇來解釋，呼應了中國因襲已久的軍事知識。而就明代倭寇本身的組成來說，本就包含歐洲人（葡萄牙人），且其與沿海刁民相互勾結、與北方韃靼人共同造成「南倭北虜」的壓迫，正與道、咸年間的內憂外患有雷同之處。是以無論殖民帝國與太平軍、穆斯林等內叛彼此之間有無聯繫，都被看作狼狽為奸的惡徒──小說家遂在此將歐洲與日本「桅／危」影重疊，亦即同樣來自海洋的威脅，並據此召喚勝國刻骨銘心的倭寇記憶。

三、天朝的維持：蕩平叛逆的想像

道、咸年間的兩次鴉片戰爭，就中方來說可說是灰頭土臉。儘管英法聯軍在大沽口遭受僧格林沁之重挫──多艘炮艇毀滅、擱淺，四百名英國人死傷，高達廿九人是軍官，曾歷經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1853-1856）死傷慘重的衝鋒的陸戰隊員甚至認為，寧願重來那場戰鬥三次，也不願受這次失敗的苦；對歐洲人來說，這次完全是武器和戰術屈居下風，且更糟糕的是敗於中國之手！[26]然

[24] 在一開始，太平天國打著拜上帝的旗幟，且稱歐、美為「洋兄弟」的立場，確實贏得了西方世界的好感，具有參謀地位的「干王」洪仁玕（「天王」洪秀全的族弟）亦與傳教士保持情誼。但隨著洪秀全愈來愈不容他人挑戰其地位，以有位傳教士宣傳洪秀全不是真正的天王、太平天國不是真正的天國之事件為導火線，終於使洪秀全撤銷洪仁玕涉外事務的職掌，西方傳教士無法找到溝通的窗口，雙方教義越發背道而馳，太平天國亦逐漸失去了「洋兄弟」的支持。見（美）裴士鋒著，黃中憲譯，譚伯牛校：《天國之秋》，頁 244-247。

[25] 大鹽平八郎是位陽明學者，被認為曾在審判「基督教邪教徒事件」中獲得基督教知識，後來因不滿官府對天保大饑饉（Tenpo famine，1835-1837）難民的冷漠，舉兵起義，不幸在大阪（Osaka）事敗自焚，但傳說其實未死，有藏身深山、孤島、遠遁歐洲、美國等說法，更有作為「東海偉人」來華收編上帝會、以其子格之助為洪秀全（兩人年齒相當）的大膽臆測，而後來的太平軍內訌，則是因為諸王察覺到洪氏實為日本人的緣故。詳參（日）增田涉著，由其民、周啟乾譯：《西學東漸與中國事情》，頁 99-128。該說主要來自於石崎東國：〈大鹽平八郎〉，《中央史壇》（1921 年）。

[26] （美）裴士鋒著，黃中憲譯，譚伯牛校：《天國之秋》，頁 44-45。

而，嚐到勝果的滿清卻難敵捲土重來的聯軍。次年（1860），英國帶來首次用於實戰的阿姆斯特朗炮（Armstrong Gun），僧格林沁麾下的六萬蒙古鐵騎完全潰敗，京城淪陷，天子倉皇西狩[27]，中國維持天朝秩序的夢想可謂曇花一現。

《花月痕》中關於這種局面，時時流露出惴惴之語，這主要藉由窮苦羸弱的韋癡珠大發牢騷，如第 19 回：

> 癡珠換過衣服，喝過茶，見采秋、秋痕同坐牀沿，聽荷生說那江南軍務，講得令人喪氣。便吟道：「華夷今混合，宇宙一膻腥。」（頁 152）

又 29 回：

> 癡珠笑道：「好好中華的天下，被那白鬼烏鬼鬧翻了。自此士大夫不徵於人，却徵於鬼！東南各道，賊臨城下，也有做起四十九日醮場的；也有建了四十九日清醮的，這會通天下的人，皆是個冒失鬼，豈獨你家有這鬼頭鬼臉，幾個小謬鬼？」（頁 250）

「白鬼烏鬼」，指的當是歐洲列強及其非洲裔、印度裔部隊。在小說一開始就提到，韋癡珠於海警初期便上「平倭十策」，卻不受皇上青睞。奇怪的是，「平倭十策」的具體內容究竟為何，魏秀仁未曾敘明，但卻播名天下，連柳陌花衢的劉秋痕都如雷貫耳[28]，朝廷反而推聾裝啞。韋癡珠的明主見棄，反映著那個時代文人對於國家動盪的哀鳴，亦摻雜了作者個人政治生涯的蹇促。[29]然而，《花月痕》並不滯於此凋零殘缺的悲慘色調，如劉紅林即指出，面對清朝對外戰爭的失利，自有力挽狂瀾之人，乃由出身師爺、文武兼備的韓荷生，以及才色雙全、助夫勦逆的杜采秋，共同累積戰功，官至封侯，寄託著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守舊士大夫對王朝中興的一種幻想。[30]

韋癡珠與韓荷生正是一組「消極／積極」的對比，正如論者指出的，十年前上「平倭十策」遭冷落後，韋癡珠對功名再沒有努力過，平日只是吟詩、飲酒，流連勾欄，在別人眼中是「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相較於韓荷生用自己的行動贏得榮華富貴，韋癡珠只能陷入懷才不遇的窘境。[31]在這種情況下，「平倭十策」這乍看響叮噹的救國良方，實在帶有反諷的味道，內容也的確不重要，因為

---

[27] （美）裴士鋒著，黃中憲譯，譚伯牛校：《天國之秋》，頁 110-118。

[28] 《花月痕》第 9 回：「單說秋痕這一夕回來，想道：『癡珠淪落天涯，怪可憐的！他弱冠登科，文章經濟，卓絕一時，「平倭十策」雖不見用，也自轟轟烈烈，名聞海內。……！』」（頁 62）

[29] 可參見羅曉沛：〈韋癡珠的憂患意識〉，《零陵師專學報》第 1 期（1993 年），頁 69-71。

[30] 劉紅林：〈試論晚清小說《花月痕》的現代屬性〉，《明清小說研究》第 3 期（2008 年），頁 184。

[31] 孫丹虹、王枝忠：〈《花月痕》雙重含義的闡釋〉，《廈門教育學院學報》第 8 卷第 3 期（2006 年 9 月），頁 26。

獻此計者本身就毫無行動力，只不斷將光陰虛擲於無聊且反複的應酬、行令、怨懟罷了。[32]韋癡珠唯一發揮雄才是在第 20 回，為書中勇猛的將帥們繪出平叛掃逆的藍圖：

> 話說逆倭騷擾各道，雖大江南北官軍，疊次報捷，而釜底遊魂，與江東員逆，力為蜑蠻，攻陷廣州，擄了疆臣，由海直竄津沽。謖如起先以南邊軍功，薦升參將；後來帶兵赴援并州，又晉一級，就留大營。元夕一戰，應升總兵，此番朝議，以謖如係將門子孫，生長海壖，素悉賊情，故有寶山鎮之命。臨行向癡珠詢問方略，癡珠贈以「愛民禮士，務實攻虛，練兵惜餉，禁海爭江」八策，約有萬言。大意是說南北諸軍，連營數百里，都靠不住；必須自己携帶親兵，練作選鋒，才可陷陣。其平定大局，則以內治為先；內治則以掃除中外積弊為先；積弊掃除，然後上下能合為一心，彼此能聯為一氣，庶幾旌旗變色，可復武漢，以踞賊上流；可定九江，以剪賊羽翼，可清淮海，以斷賊要隘。三者得手，直攻賊巢，金陵唾手可復。後來韓荷生平倭、平江東，謖如平淮北、平滇黔、平秦隴，以此戰功第一，並為名將。（頁 155）

「攻陷廣州，擄了疆臣（葉名琛），由海直竄津沽」都是清廷與歐洲人齟齬的重現。而對世變的嗟嘆主要出於韋癡珠，其人至多可以出謀劃策，但談笑用兵，拯民水火的實踐者則必須是韓荷生。早在偕韋癡珠正式面會之前，韓荷生即有「火樹銀花元宵奏凱」（第 4 回）大破回、番的戰功、又在靖海以伏兵殺敗逆倭，令其退出小直沽（第 43 回），這顯示魏秀仁在續寫 44 回之後韓、杜的勇武歷險，並非如王德威所謂「無視其初稿演義的情操脈絡」[33]，而乃是一以貫之的弭亂想像。韓荷生在書中最大的功績發生於 47 回：

> 接着津門逆倭凶悖，重臣賜帛，詔各道勤王。荷生引見後，特旨召問勦撫機宜。荷生對以「勦然後撫」，允合聖意，次日奉旨：「韓霖着以兵科給事中，賞加建威將軍職銜，帶領帥印上方劍，馳往津門，相機進勦倭寇。兵馬錢糧，悉憑調用；各道援師，悉聽節制。欽此。」……遂擇日祭旗，連營海口，誘賊上岸，三戰三捷，沉了火輪船二十七座，擒了倭鬼萬有餘人。荷生傳令，各營倭鬼，悉數縱回，只留倭目數人，押送保定看守，以俟勘問。這是本年秋間的事。……到了次年庚申秋，逆倭又自粵東駛船百餘艘，游弋海口，欲謀報復，却不敢上岸，荷生復行申討。

[32] 正如王德威對韋、劉這對愛侶的分析：「雖然他們兩人從一開始就被剝奪了應有的意志與權力，完成情緣，但私下裡，他們儼然耽溺於必敗的情境，毫無還手的意願與能力，不知伊於胡底。疾病、貧困、家庭的分離、政治的騷亂，與其說是傳統姻緣完成前的必要考驗，不如說加速了意料中的悲劇。」見氏著，宋偉杰譯：《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頁 108。

[33] 王德威著，宋偉杰譯：《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頁 113。

> 賊正轟炮，忽倒了炮手三人，執旗大頭目一人，你道為何呢？原來卓然百步射，果齋連珠箭，都展出神技來。以此賊不敢戰而去。（頁 391-392）

此津門大戰的情節，顯然即是中國與歐洲侵略者於大沽口海戰（Battle of Taku Forts，1859）交鋒的翻版。在魏秀仁筆下，時間的輪軸彷彿推移回令人振奮的 1859 年，清軍在大沽口的壓倒性勝利，而且從此將戰功延續至隔年（庚申秋，即 1860）：「逆倭」沒有登陸北塘，王師沒有被重炮轟垮，天子沒有「巡幸木蘭」，圓明園亦沒有被洗劫一空、付之一炬的恥辱，自然沒有惱人的城下之盟的締結。不過，這一切都是小說家在架空世界的自我慰藉；在虛構的特權當中，靠著虎豹之將的「神技」：卓然百步射，果齋連珠箭，強弓勁弩的冷兵器甚至足以擊潰堅船利炮的熱兵器。

除了這場讓「逆倭」心悅誠服的勝利外，《花月痕》尚有其餘為天朝秩序之維持貢獻心力的角色。首先是李謖如：

> 話說謖如是去年十一月到任，申明海防舊禁，修整本部戰艦，出洋巡哨，逆倭三板船，從此不敢直達建康；就是員逆，也有畏忌。江南、江北一帶官軍，因此得以深溝固壘，臥守一冬。（第 42 回，頁 349）

這種「申明海防舊禁」的戰略，很明顯屬於保守、封閉的明、清海洋思維，但小說家卻吹捧其恫嚇「逆倭」的效果，可見魏秀仁期望的不是一個走向世界舞台的開放中國，而是自給自足，恪守華、夷份際的天朝文化圈。

而除了嚴防疆場的軍官外，淫蕩的娼妓：潘碧桃，亦用其身體護持住了這個理想的秩序觀。小說敘述「員逆」麾下有個劇盜呂肇受，坐擁淮北鹽利，與捻首互為唇齒，以此餉足勢強，後來得了碧桃，卻是天生一對。碧桃亦在床第之間獻上「枕邊靈」：

> 尤可喜者，一夕枕上，兩人各訴衷曲。碧桃說道：「你如今富貴極了，只是依人，自來是沒結果呢！你怎不反正？將淮北鹽利，獻與朝廷，必有一番獎勵。然後請率所部討賊，就這千餘里地，徵稅課，做我糧餉。金陵守得住，我且霸住一方；金陵守不住，我便是做個陶朱翁。你道好不好呢？」說得肇受一蹈踉跳起，拍掌道：「上策上策！娘子軍我先要投降了。」次日，肇受果然託記室做個降書，又遣人私送北帥許多財物。後來奉到諭旨，着授淮北提督，改名蓋忠，碧桃竟自得了一品夫人的誥命。（第 47 回，頁 377-378）

碧桃是小說中不太起眼的人物，這位生張熟魏的娼婦，不如秋痕、采秋般出淤泥而不染，但恰如王德威省思賽金花（或《孽海花》中的傅彩雲）靠著與德國瓦德西（Alfred von Waldersee）元帥的巫山雲雨，抑制八國聯軍（Eight-Nation Alliance，1900）暴行的傳說：為國捐「軀」可以從字面上解釋，盡忠報國不必以貞潔為前

提，萬惡之首的淫或許能以一種迂迴方式拯救國家的危機。[34]饒富意味的是，《花月痕》以「樅陽縣佳人降巨寇」作為類似情節的橋樑，前、後串起的是嘉靖大倭寇（Jiajing Wokou）期間，勸降魁首徐海的秦淮名妓王翠翹[35]，以及傳奇女子賽金花的一系列帶有情慾色彩的身體政治神話──當魏秀仁以明代倭寇記憶招魂，多少也有有心致敬王翠翹、無心插柳綻金花的味道。

無論是靠將士的武藝，抑或名妓的胴體，外侮內叛總算被壓了下來，但中國傳統的秩序觀並非僅有威嚇的一面，尚有懷柔的手段，如諸葛亮降伏南蠻，讓外邦異族感恩戴德，才是魏秀仁心目中最理想的華、洋關係。證據是 47 回顏卓然宣詔提到：「夷漢相安，則撤孔明之旅」（頁 394）；49 回又說李謖如生擒回首士文綉：「仿着武侯七擒七縱意思，請旨赦了文綉，賞給世襲總兵銜，鎮守永北、開化二郡，提督回部」（頁 412）。

《花月痕》明言中國與逆倭不是講和，而是納降，並准許上海、舟山、閩安、廈門、濠鎮為「倭船」停舶埠頭（這其實也就是列強對中國開埠，「五口通商」的要求），在有限度的情況下允許貿易，恢復了沿海的法治與安寧，亦顯示上朝的天恩浩蕩。在此恩、威並重的規箴之下，確立了中、倭「上國／藩屬」的地位；除了前文提到的冊封典儀之外，創作者更插入一段倭目勤王的功勞：

> 將到行營，遙見無數倭人，刀如霜雪，槍似林蒼，又覺陡然。青萍接着回道：「倭人解來金陵遺孽員莆田，前來請令。」……倭目數十輩，亮甲掛刀，一字兒跪接。荷生轎中點首示意。……帥旗一展，升炮三聲，荷生衣冠升帳，中軍傳呼倭目一人進見。倭目報名，巡捕官領跪階下。……哈巴哩道：「元帥克復金陵，莆田隨着偽王娘馬氏，偽丞相鄧際盛，又偽官等數十人，竄上清涼山洞，洞裏原有儲糈。經歷兩個月，食也盡了，將金寶航海，投奔香山，懇求我們帶他回國，保全這數十條性命，我們竊念元帥號令威嚴，小國新受皇上天恩，不敢護庇叛逆；計誘登島，悉數擒獲，押解前來。探得元帥行營，特由粵洋駛着輪船；清晨到了，就來轅門伺候。」荷生欣然道：「你等恭順可嘉，靜待本帥奏聞獎賞罷！」哈巴哩叩頭稱謝，就吩咐杭守，延入行館，優待去了。（第 50 回，頁 419）

這個細節的書寫，恰恰呼應了 1861 年英國國會議員鄧洛普（Alexander Dunlop）的疑慮──1860 年，駐華公使卜魯斯（Frederick Wright-Bruce）允許軍隊向進攻上海、但無意於傷害「洋兄弟」的太平軍開火，造成了單方面的狙殺，違反了中立原則：

---

[34] 王德威著，宋偉杰譯：《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頁 141。

[35] 關於王翠翹故事之研究，可詳參陳益源：《王翠翹故事研究》（台北：里仁書局，2001 年）。

airiti

> 卜魯斯於一八六〇年接受清廷付款以支付守衛上海的開銷——鄧洛普稱（小心避用「傭兵」一詞）此舉已使中國皇帝得以「將我們女王稱作他的封臣之一，我們女王出兵保衛中國，然後如屬國般從他那兒領取報酬。」[36]

「倭目」活捉「偽太子」，為《花月痕》捻熄了最後一點戰爭星火，雖屬虛構，但亦非全是空中閣樓。事實上，英國基於經濟利益之考量，不知不覺往清廷靠攏，確實帶來「英國政府變成清朝統治者抱在膝上玩賞的小狗」[37]之聯想；對小說創作者來說，韓荷生擊潰並收服「逆倭」，納為己用，正是一種傳統士人對王朝中興的寄託──書中放大了清軍的戰功，扭曲了歐洲人支援清廷的緣由與方式，便形成了這樣天朝秩序維持的想像。楊雄林認為：「前期狹邪小說的創作者正是借助『保守主義』的烏托邦心態對歷史進行重新的審視，這其中有對現實的批判，更多的卻是對過去的緬懷，一次蒼涼的回眸。」[38]這不僅在秦樓楚館的耽溺是如此，對國家的撥亂反正的企盼更如是，職是，小說結局作者這樣提出對「太平盛世」的期許：「宇宙清平，夷狄歸化」。[39]

四、身體與國體：兩種政治生涯的隱喻

儘管《花月痕》一向被視為狹邪小說，但其實即便在狹邪小說的族裔中，若干作品也並不因此陷溺於對「花榜」的品賞與耽美，或是僅只於燕侶鶯儔的繾綣生涯；恰恰相反，包括余懷《板橋雜記》以明末清初的秦淮歌妓為描摹的主體，表現出美人黃土的遺民之思[40]，而從李香君、柳如是、陳圓圓和董小宛等名妓的身上去窺視，遭逢世變的感情悲劇，亦同時載負了一定的歷史向度。[41]就連被視作「嫖界指南」的《九尾龜》，也將歡場與官場平行並置：男主角章秋穀在「私領域／公領域」的成與敗，映照了命運弄人的怨懟（ressentiment）。[42]狹邪形式不完全意味著對現實的逃避，有時反而更多地輻射出個人與家國的處境。於是在魏秀仁的筆下，「名士／美人」即是一組倒影：「美人墜落，名士坎坷；此恨綿綿，

---

36 （美）裴士鋒著，黃中憲譯，譚伯牛校：《天國之秋》，頁 253。

37 （美）裴士鋒著，黃中憲譯，譚伯牛校：《天國之秋》，頁 389。

38 楊雄林：〈烏托邦與救贖──論前期狹邪小說的歷史文化症候〉，《佳木斯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 25 卷第 4 期（2007 年 7 月），頁 71。

39 《花月痕》第 52 回：「看官！你看這時候是什麼時候？宇宙清平，人民壽考，夷狄歸化，五穀豐登；萬頃情波，都成覺岸；千重苦海，盡泛慈航。』」（頁 437）

40 參胡衍南：〈明清「狹邪筆記」研究──以明代後期至清代中期為範圍〉，《淡江中文學報》第 29 期（2013 年 12 月），頁 143-152。

41 王德威著，宋偉杰譯：《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頁 86。

42 王德威著，宋偉杰譯：《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頁 120-122。

怎的不哭」（第 14 回，頁 94）、「本來名士即是美人前身，美人即名士小影」（第 16 回，頁 117）職是，當說部以狹邪形式同情美人的淪落，也正是哀訴名士的不遇[43]，並蘊藏出對「醫國」的焦慮與寄託。

如果將小說作為一個整體來探析，則韋癡珠與韓荷生明確象徵了兩種政治道途，不宜分割開來，就像花開花謝，月盈月缺，但卻共同構成了「痕」的軌跡。誠如金洛喆所說：

> 由於作者在《花月痕》書中所創造的兩個世界是如此鮮明，而它們的對比又是如此強烈，當然這兩個世界是貫穿全書最主要的線索，假若把握到這條線索，就等於抓住了作者在創作企圖方面的中心意義及一己的哲學思想。本書內容中，這兩大主幹很密切地糾纏在一起的，任何企圖把它們截然分開並對它們個別的、孤立的瞭解，都無法把握到《花月痕》的內在完整性，因為這正是《花月痕》所必有的內在發展因素所致。[44]

兩種政治生涯，是否僅僅是魏秀仁個人際遇的投射呢？筆者認為，這部份當然是有的，但倘若將眼光放遠一點來看，這更是一種身體與國體之間的隱喻。雖然黃金麟以為，中國關於改變人民身體，以達到改變國力體質之思考所出現的時間點，不在鴉片戰爭，而在甲午之役的恥辱後[45]，顏健富關注小說中「病體中國」的隱喻與治療，亦以晚清為探討的主軸[46]，不過，中國以身體比擬時局的敘事策略並非晚近之事──至少在《三國演義》「諸葛亮舌戰群儒」情節中，便曾有一段「醫病」關係的精彩譬喻。[47]

《花月痕》儘管因時間斷代之關係（介於鴉片戰爭與甲午之役間的文本），未被學界納入「身體／國體」之討論，綜合來看，也的確無法達到甲午戰後的勃

---

[43] 關於「晚清」、「優伶」、「妓女」的互喻性，亦可見楊雄林：〈烏托邦與救贖──論前期狹邪小說的歷史文化症候〉，頁 70。其以為狹邪小說可作為才子佳人小說的一道分流，佳人的淪落煙塵，與晚清中國的國運衰微，社會動盪是呼應的關係，當時文人乃是在狹邪形式中隱喻了香草美人之思。

[44] （韓）金洛喆：《花月痕研究》，頁 47。

[45] 詳見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頁 44-55。

[46] 詳見顏健富：〈「病體中國」的時局隱喻與治療淬鍊──論晚清小說的身體／國體想像〉，《台大文史哲學報》第 79 期（2013 年 11 月），頁 83-118。

[47] 《三國演義》第 43 回，諸葛亮言劉備軍勢小弱，須慢慢壯大，以此議論：「譬如人染沉痾，當先用糜粥以飲之，和藥以服之；待其腑臟調和，形體漸安，然後用肉食以補之，猛藥以治之；則病根盡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氣脈和緩，便投以猛藥厚味，欲求安保，誠為難矣。吾主劉豫州，向日軍敗於汝南，寄跡劉表，兵不滿千，將止關、張、趙雲而已：此正病勢尪羸已極之時也。」見〔明〕羅貫中：《三國演義》（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4 年），頁 379。

興高度，但仍萌發出略俱規模的苗芽，可以作為一種前沿性的材料來窺探。[48]第26回王漱玉捎給韋癡珠的書信，先由問候其病體開始，進而轉入醫國之論述：

> 中秋既望，從劉世兄處，得七月初二來書，甫悉玉體違和，留滯途次。南邊兵燹，誰實為之？而令吾兄故里為墟，侍姬抗節！所幸陔蘭池草，以及珍髦掌珠，均獲完善，則遠人當亦強自慰藉。人生非金石，愁城豈長生之國哉？總要吃力保此身在，其餘則有天焉。……昔宋歐陽永叔有言，醫者之於人，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今天下荼毒，無復人氣；然則治其受患之處，而與之更始，奈何？曰，培元氣而已。（頁 195-196）

漱玉之信甚長，不能俱引，但接下來期勉韋癡珠作為「國手」出而醫國，使國家之元氣斷而未斷、乾坤之正氣亡而不亡，關鍵在於「保此身在」（勸勉其保重病體），俾使國家血脈流通，膚革充盈云云，其中都有個將「身體／國體」視為一體的內在聯繫。小說評者認為，「五十二回文字，總以此壓卷」（頁 198），顯示此文在《花月痕》中的位置與份量，讀者不可輕輕放過。

在「逆倭」的騷擾之下，魏秀仁既要維護天朝的體面，又要幽微指出國家受此動盪，咸豐帝不得已離京的羞辱，只能由書中第一男主角擔負起「我原想入都，遵海而南，偏是病了。接着倭夷入寇，海氛頻起，只得且住」（第 24 回，頁 202）的寥落與迍邅。換句話說，小說家是以韋癡珠代替歐洲列強侵華之後，上自天子，下至黎庶，流離失所的國家瘡痍。韋癡珠的貧、病，即象徵著中國的闇弱；其人的奴僕是「禿頭」，而其意中人的丫鬟是「跛脚」，以此畸零殘缺的身體，呼應著韋、劉愛情生涯的苦澀，也是清朝無力於內、外交迫的投射。

透過第 14 回劉秋痕與韋癡珠首次見面時（在此之前劉只偶然看過韋的小照）的問候：「韋老爺！你怎的比那小照清減許多了？」（頁 95）以及同一回韋癡珠對韓荷生「花魂」詞的讚嘆：「好個『瘦不禁消，弱還易斷』八字！這便是翦紙招我魂哩！」（頁 97）在這兩個場景表露出來的，是小說家對清帝國的榮光的懷想，消瘦的身軀與失落的靈魂，暗喻著強盛中國邁向老大病衰的丟魂失魄。一如晚清論者一再馳返「招魂」傳統，要將病體中國「淬魂鍊體」，鎔鑄「山海魂、軍人魂、遊俠魂、社會魂、魔鬼魂」[49]，《花月痕》是用溫婉的氛圍，醞釀著後起

[48] 後文將介紹的曾紀澤〈中國先睡後醒論〉（1887）也說：「說者觀此，遂謂國與人無異；人有幼年壯年老年，一息待盡之年，國亦有之」、「如謂中國有似年老者奄奄待盡，則觀近時大勢，其謬益見」，並以「焦及眉毛」比喻圓明園大火的嚴重（見〔清〕曾紀澤：〈中國先睡後醒論〉，頁 90-91），也都屬於「身體／國體」之間的轉喻，可見相關觀念不一定僅止於甲午戰後，方見其端。

[49] 顏健富：〈「病體中國」的時局隱喻與治療淬鍊——論晚清小說的身體／國體想像〉，頁 101-103。

者炙熱激昂的呼嘯。

儘管漱玉代作者言，然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韋癡珠終究沉痾難返，病入膏肓。清朝的疲軟是現實，小說家亦很清楚，於是第 36 回用「氣數」二字說明「天／人」之間的拉扯：

> 看官，須知氣數兩字，埋殺多少英雄豪傑；除非神仙，跳出世外，不受這氣數束縛。自古忠臣孝子，到得國家氣數要盡之時，怎樣出力去挽回，你道有幾個挽回得來？不過人事是要盡。秋痕這一回打算，也祇是盡人事罷了。再隔十日，兩人局勢，又不是這般，你道人事怎盡呢？（頁 307）

也因此，對於時局的寄託，就轉移到韓荷生（魏秀仁理想的政治生涯與天下秩序）身上。《花月痕》屢屢提到韋、韓命運的交會，第 5 回「荷生東平回匪，那時正癡珠西入蜀川」（頁 27）、第 11 回「荷生宴客這兩日，正是癡珠病篤的時候」、第 39 回「癡珠、秋痕散局這一天，却為荷生、采秋進城之前一日」（頁 329），顯示韋、韓確實是兩條窮達榮辱的岔路，也是中國現在與未來的兩種選擇。

作為對比的韓、杜二人，呈現的是與韋、劉截然不同的命運。韓荷生固然如前文提到，是清掃島氛的中興功臣，但杜采秋卓越進取的才幹與性格，更是這對眷侶飛黃騰達的關鍵。杜采秋在韓荷生欲求歸隱之際，總是表達不支持的態度[50]，且在小說尾聲甚至親自披掛上陣、與妖婦鬥法，和坐困愁城的劉秋痕判若雲泥，這位奇女子象徵了墮落之「身體／國體」洗淨風塵的可能，魏秀仁在其身上召喚明、清才子佳人小說中，女主角才、美、膽、識、情兼具的黃金歲月[51]，一如召喚著中國的鼎盛年代，就連貼身美貌的侍兒：紅豆，也和跛脚形成一組對照──當韋、劉走向殉情的死胡同，卻是韓、杜平步青雲的起點；花謝必有花開，月缺終會月圓，「身體／國體」在此「痕」的軌跡中有了否極泰來的可能。正如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所說的：

> 疾病源自失衡。治療的目標是恢復正常的均衡——以政治學術語說，是恢復正常的等級制。大體來說，這種診斷總還是樂觀的。按理，社會是永遠不會患上一種不治之症的。[52]

從鴉片戰爭到太平天國，魏秀仁皆躬逢其盛，且深受烽火牽連，客居異鄉，自然百感交集。但中國畢竟還是如其期望的一般，挺過了「倭寇」與「員逆」的內憂

[50] 孫丹虹、王枝忠：〈《花月痕》雙重含義的闡釋〉，頁 26。該文以 26 回、29 回兩處韓荷生流露退步之意，杜采秋皆岔開話題，虛與委蛇為例，顯示「實際上是因為她對隱居絲毫不感興趣，她嚮往的是功成名就，讓人企羨的生活，這便是她內心潛意識的流露。」

[51] 參蘇建新：《中國才子佳人小說演變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年），頁 84-86。

[52] （美）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著，程巍譯，《疾病的隱喻》（台北：麥田出版，2012 年），頁 94。

外患。在小說家的晚年，清廷開啟了如火如荼的的自強運動（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1861-1895），漸次走向富國強兵的路途。雖然與魏秀仁頻頻回顧的天朝秩序有所出入，但到底是朝著「吃力保此身在」而醫國的方向調養。其逝世後，曾紀澤〈中國先睡後醒論〉（1887）有言：「愚以為中國不過似人酣睡，固非垂斃也」[53]，終有醒轉過來的一天，而且西方世界亦沒有揶揄嘲諷，反而給予相當程度的肯定。[54]可以理解的是，「睡」與「醒」是一種對於中國由衰而盛所提出寄託的修辭策略，上文提到的韋、韓命運的替換，其實也可以視為中國「睡」與「醒」的交錯。事實上，小說中的韋癡珠也並未真正地死去（似人酣睡，固非垂斃），除歸返仙鄉之外，51 回韓、杜共得異夢：「却夢見癡珠做了大將軍，秋痕護印，督兵二十萬，申討囘疆。荷生覺得自己是替他掌文案；謖如、卓然、果齋等人，都做他偏裨；春纖、掌珠、寶書也做先鋒。」（頁 426）顯示了韓荷生是代替韋癡珠發跡變泰，猶如中國的歷劫新生。

但令人唏噓的是，熟睡的中國、羸弱的中國，正待如韋、韓命運錯身般浴火重生之際，卻在 1894 年被魏秀仁不幸言中的敵人──日本（倭寇）給打回原型。如果說晚清小說關於「病體／國體」討論的勃興，是受到甲午戰爭的刺激，《花月痕》在搬演相關概念時，卻歪打正著地以預知者的姿態站在歷史的前沿，提醒時人重新檢視當代所面臨的海權挑戰，其實並非一個新穎的課題，至少在前朝倭患甚殷的挫折中，就一直存在著「望洋興歎」的困窘。當作者召喚明朝倭寇記憶，來影射歐洲列強時，當然不能逆睹後來日本於甲午之役的成功，但卻在桅影重疊的敘事策略中，意外產生饒富意味的鎖鏈效應。當魏秀仁以保守的心態凝視此變局，用韋、韓兩種政治生涯道出其「身體／國體」之寄託，讓「倭國」收入上朝藩屬的版圖時，卻讓強鄰戳破了這個樂觀的想像。更諷刺的是，小說家選擇將歐洲人與中國人熟悉的倭寇兼併在一塊，日本卻漸次走向了歐化的道路，再次尋釁而來時，已非復吳下阿蒙，搖身一變為亞洲最剽悍的殖民帝國。作者固然係以守舊的海防經驗歸納歐洲列強的侵略，但也巧妙地提醒了時人必須保持對日本的警戒，只不過說部之言，在現實當中並未激起太多漣漪；中國也就在「敏銳」與「遲鈍」的擺蕩之中，終究還是走向了甲午戰敗的恥辱。

五、結語

以往學界將《花月痕》放在「狹邪小說」的脈絡，看重的是其中繾綣哀婉的青樓性質，但作者魏秀仁身為一位飽受兵燹波及、顛沛流離的失意文人，對鴉片

[53] 〔清〕曾紀澤：〈中國先睡後醒論〉，頁 91。

[54] 見楊瑞松：《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台北：政大出版社，2010 年），頁 117-119。

戰爭以降中國所面對的內亂、外患有著深刻的體悟，自云這部小說「豈為蛾眉修豔史？權將兎穎寫牢騷！」（第 52 回，頁 436）這番議論，非是無病呻吟，而堪稱出於肺腑。職此，其中的「宏大敘事」，亦當有討論的價值──在這部小說中，狹邪形式並不意味著遠離現實，而是訴諸於「美人墜落，名士坎坷」的「身／國」互喻，並藉由兩組愛侶：「韋癡珠／劉秋痕」、「韓荷生／杜采秋」在歡場的錯身，表現出苦盡甜來，方死方生的敘事基調，猶如同花、月之「痕」的迤邐綿延，映照著中國所面臨的挑戰與歷劫歸來的信心。

而在現實處境與虛構文本中，作者對於內憂外患的塑造亦展現了層層重疊的引譬連類。本文認為，小說家在塑造當代面對的歐洲列強時，是以同樣來自海洋的明朝倭寇形象作為「桅／危影重疊」的記憶召喚，這一方面來自於中國士人慣於用古籍、傳說、類書等帶有想像色彩的文獻來理解殊方異域的新事物，二來則與明、清一貫的海防經驗，皆把倭寇視為主要假想敵有關──儘管因德川幕府、大清帝國各自實施鎖國政策，雙方在甲午戰爭之前從未有過交戰的紀錄。此外，倭寇本身組成相當複雜，在明朝的定義中，甚至包含同樣來自歐洲的「佛狼機國人」（葡萄牙人）；而且倭寇常與沿海奸民勾結，與北方的蒙古人一起點燃「南倭北虜」的氣燄。這個亂局正與清廷同時面對英法聯軍、太平天國、捻亂、回變等內憂外患如出一轍，是以《花月痕》順理成章地將這些叛逆綰合在一起，宣稱這是「逆倭」刻意組織的串連行動：「乃躪東南，遂窺西北」。

清朝曾靠著名將僧格林沁的戰略佈署，在大沽口痛擊歐洲艦艇，隔年卻兵敗如山倒，京都陷落，天子西狩。但小說創作者靠著虛構的特權，讓韓荷生取得令倭寇心悅誠服的勝利，使時間停止在榮耀的一刻，抹去了羞辱的慘敗，顯示的是一種維護天朝秩序的華、夷觀。此外，靠著冶豔的潘碧桃為國捐「軀」，招安了劇盜呂肇受，正與嘉靖大倭寇期間王翠翹降伏魁首徐海的事蹟互為表裡。透過武藝與胴體，外患與內憂同時納入上國藩屬的版圖，甚至還為剿滅太平天國貢獻勤王的功績。英國政府變成清朝統治者抱在膝上玩賞的小狗，《花月痕》終於在能故事的結尾高奏「宇宙清平，夷狄歸化」的凱歌。

最後，小說是以韋癡珠、韓荷生兩種政治生涯作為隱喻，以「身體／國體」的醫病關係期待中國「吃力保此身在」，而後花謝花開，月缺月盈，暗示中國「先睡後醒」的光明未來，顯露保守勢力對王朝中興的幻夢。諷刺的是，魏秀仁在未能逆睹日本維新成功的情況之下，將歐洲人與中國熟悉的倭寇記憶兜攏在一塊，日本卻逐漸走向歐化的道路，以中國陌生的殖民帝國姿態粉碎了《花月痕》的樂觀想像──歷史輪軸無情的推移，並未如創作者架空般的倒轉與停滯，反而朝向令人難堪的羊腸小徑去發展。

airiti

徵引文獻

一、傳統文獻

〔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
〔明〕羅貫中：《三國演義》，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4 年。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
〔清〕曹雪芹：《紅樓夢》，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4 年。
〔清〕魏秀仁：《花月痕》，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6 年。
〔清〕龔自珍、〔清〕康有為、〔清〕梁啟超等著，龍應台、朱維錚編注：《未完成的革命──戊戌百年紀》，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

二、近人論著

王昊：《從想像到趨實：中國域外題材小說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
王俊年編：《中國近代文學論文集（1919-1949）：小說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年。
王德威著，宋偉杰譯：《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台北：麥田出版事業部，2003 年。
李恭忠、李霞：〈倭寇記憶與中國海權觀念的演進──從《籌海圖編》到《防洋輯要》的考察〉，《江海學刊》第 3 期（2007 年 3 月）。
尚達翔：〈魏秀仁和他的哀豔小說《花月痕》〉，《明清小說研究》第 4 期（1988 年）。
胡衍南：〈明清「狹邪筆記」研究──以明代後期至清代中期為範圍〉，《淡江中文學報》第 29 期（2013 年 12 月）。
孫丹虹、王枝忠：〈《花月痕》雙重含義的闡釋〉，《廈門教育學院學報》第 8 卷第 3 期（2006 年 9 月）。
陳芳華：〈百年來《花月痕》研究評述〉，《遼寧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1 卷第 1 期（2009 年 1 月）。
陳益源：《王翠翹故事研究》，台北：里仁書局，2001 年。
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
舒揚帆：〈試論魏秀仁《花月痕》的自敘性──兼及藝術淵源與影響〉，《呼倫貝爾學院學報》第 21 卷第 6 期（2013 年 12 月）。
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 年。

楊雄林：〈烏托邦與救贖──論前期狹邪小說的歷史文化症候〉，《佳木斯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 25 卷第 4 期（2007 年 7 月）。
楊瑞松：《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台北：政大出版社，2010 年。
鄭樑生：《明代中日關係研究──以明史日本傳所見幾個問題為中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 年。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
劉紅林：〈試論晚清小說《花月痕》的現代屬性〉，《明清小說研究》第 3 期（2008 年）。
顏健富：〈「病體中國」的時局隱喻與治療淬鍊──論晚清小說的身體／國體想像〉，《台大文史哲學報》第 79 期（2013 年 11 月）。
羅曉沛：〈韋癡珠的憂患意識〉，《零陵師專學報》第 1 期（1993 年）。
蘇建新：《中國才子佳人小說演變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年。
（日）田中健夫（Tanaka Takeo）著，楊翰球譯：《倭寇──海上歷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7 年。
（日）增田涉（Masuda Wataru）著，由其民、周啟乾譯：《西學東漸與中國事情》，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 年。
（美）裴士鋒（Stephen R. Platt）著，黃中憲譯，譚伯牛校：《天國之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全球與地區問題出版中心，2014 年。
（美）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著，程巍譯：《疾病的隱喻》，台北：麥田出版，2012 年。
（韓）金洛喆（Kim Nak-chul）：《花月痕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年。

airiti

The Shadow of the Familiar Sailships and the Metaphor of Healing the Country: Wokou and Europeans in *Hua Yue Hen*

Tseng Shih-Hao*

Abstract

Hua Yue Hen, which completed in middle Qing dynasty is generally regarded as a novel about prostitution. However, this work also reflected the author Wei Xiu-ren's situation. Not only his personal political frustration, but also included the Opium War, the Franco-British expedition to China,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the Dungan Revolt, and the Nian Rebellion, etc. Interestingly, when the novel referring to the relevant events, usually looked upon European settlers as the invasion of Wokou. For Chinese, Japanese and Europeans were the same enemies, because both of them came from the ocean. In addition, collusion between pirates and traitors, as well as the ravages of the Yamato on the south and the Tatars on the north in Ming dynasty, reasonably be transformed into conspiracy of rebel leaders and foreign invaders in *Hua Yue Hen*. Besides, the protagonist Wei Chi-zhu was so poor and sick, suggesting that Qing government unable to resist the successive wars. However, the author also let Han He-sheng perfectly defeat the enemies, to express the expectation that China must can rise from the ashes, and get the submission of barbarians. Through two political roads, we can see Wei Xiu-ren's anxiety and aspiration.

Key words: *Hua Yue Hen*, Wokou, Europe, Opium War,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 Adjunct Instruct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